

“我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起战斗”

杨 菁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根据前不久公布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总体安排，此次将邀请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出席纪念活动。

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这样的名单还可以继续列下去。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

撰写《无问西东：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让我走近历史的烽烟，近距离感受这些外国友人炽热的“中国情缘”。他们有不同的国籍，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他们中既有全面抗战爆发后专程前来援助中国的，也有侨居中国、不顾危险在日军铁蹄下保护中国民众的；他们中有闻名遐迩、备受赞颂的人物，更有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的英雄，还有被俘受教后投身反战事业的日本战俘。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军事、新闻、医疗、经济、文化教育、人道主义救助等各个领域，有些人最后长眠于此，有些人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一生都怀念和牵挂着这片土地。

埃德加·斯诺，被称作中国革命的“报春燕”，将“红色中国”的面貌第一次展现在世界

面前。他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彼时中国全面抗战爆发，该书问世仅一个月就发行5版，拉开了西方记者赴身“红色中国”的序幕。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第一个报道中国红军的外国记者。她记录下外国记者访问延安时，同共产党领导人促膝谈心的场景，也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热情报道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还联名致信海外，呼吁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出席纪念活动。

这些外国记者不是没有看到中日军事力量的悬殊，但仍然对中国抗战的前途充满信心。为什么？因为他们耳闻目睹了中国军民的团结抗战，实地观摩了八路军对民众的教育、动员和武装，感受到了民众的觉醒和勇气。史沫特莱《中国在反击》、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人民之战》等一批作品揭示了战争真实情况，戳穿侵略者的谎言，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为生存、为尊严而战的决心，为中国抗战赢得了世界主流舆论的支持。

“马海德”，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到陕北后为自己取的中国名字。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在陕北，马海德不仅在医院坐诊，还常常背着药箱到分散在各个村子的病房四处巡查，不仅给军人疗伤看病，还给军队所到之处的老百姓诊治疾病。一次，卫生部部长饶正锡去医院检查工作，发现马海德大夫的门上没有挂科室牌子，便问院长，院长回答说：“他什么科都看，没法挂牌。再说挂了也没用，人们不管什么病都照样要找他。”

亨利·诺尔曼·白求恩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他不只是一个在枪林弹雨下救死扶伤

的外科大夫，还是一名出色的医学教育者。“有多少中国技术人员经常受训？技术工作的整体水平有没有得到提高？中国人自己能够坚持下去吗？”在白求恩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外国医疗队的价值体现”。从“流动手术医疗队”到“模范医院”再到“特种外科医院”，他因地制宜地改进医疗救助的工作方法。没有课本，就亲自编写教材；药品器械缺乏，就自己动手研发。

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约翰·马吉和其他留在南京的外国友好人士一样，每天都要忙着保护、救济难民。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他用一台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在鼓楼医院等地小心翼翼地拍摄了揭露日军暴行的影片。受其所托偷偷将电影胶片带出南京的费昊生说：“这些是如此恐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

明妮·魏特琳是当时留在南京的20多位外国侨民中的3位女性之一，也是几十家难民收容所唯一的女性负责人。她主持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要负责接收妇女和儿童，最多时接纳了1万多人。在这场卓有成效的救援中，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时刻，也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人道主义传递。

翻阅梳理史料，为这些外国友人画像立传的过程中，他们的声音在我耳畔回响：“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史沫特莱），“我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起战斗”（白求恩），“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中，我感到极大的愉快”（马海德），“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的革命事业更好更有意义”（爱泼斯坦）



斯诺(右一)在陕北采访红军战士。

江苏人民出版社供图



《无问西东：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杨菁著；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他们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作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也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

外国友人助力中国抗战的故事，一本书远远讲不完。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支持，深刻体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古训，也对当今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人类的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的背后凝结着太多人的血与泪，熔铸着无问西东的正义与勇敢。

读书有味

我在乡村教书，给孩子讲诗，许多同行都好奇：为什么要讲诗呢？既耽误教学进度，又不能让学生成绩高分，连高考试作文都标明“文体不限，诗歌除外”。可我依然在读诗、讲诗，带更多的孩子认识诗、理解诗。

王彦明

最初，我是在学校的文学社给孩子们讲，从徐志摩讲到舒婷、海子，在他们似懂非懂的时候，又折回了戴望舒、闻一多。适应诗的变化、理解诗的内涵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何况诗还有着不同的样态，而这又总让学生们对写诗充满焦虑。我跟他们说，我手写我心即可，从眼睛看到的、心里感受到的开始就行，不妨就从教室里飞不出去的麻雀写起，从冬天窗外风吹树林的声音写起。

我第一次对诗有了清晰认知，源于阅读江弱水先生的《诗的八堂课》。这本书让我理解了诗的形成机制以及诗的内部逻辑，这些知识如百川汇聚大海一般，形成了我脑海中关于诗的整体面貌。

从古典诗走向现代诗，这一发展历程中有很多突破和创新。某些诗歌阶段，譬如《诗经》《古诗十九首》出现的时代，人们会囿于音韵，但并不会“以文害意”，而到了李白、杜甫的时代，诗人们大胆突破形制，一样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一般人以仄韵形成沉郁顿挫的情绪，李清照却用密集的仄韵表达激昂的情感，随即又用清新的意象和语词对其消解，形成情感的迂回，这也是她诗歌的专属风格。

类似这样的突破和创新，不正是青年人应该呈现的精神状态吗？逐渐从稳定的节奏，走向不确定的表达，仿佛也是一场人生的隐喻。学生接受知识，是稳定态的知识，而面临人生的种种问题，则满是变数；在诗里体验这种变化，更易于学生理解和把握自己的人生。

诗没有框架，没有绝对的一致，变化就是情绪的节奏，就是时代的呼吸。到了近现代，语言现代化暗含精神的现代化。现代诗可以成为影像，也可以是瞬间的感觉，还可以是对未知世界的捕捉……它的样子，是多样而反复的。时代变迁中，人的精神需求不再单一化，尤其是年轻的同学们，接受的知识和信息使得他们往往个性突出，喜欢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不断延展，而诗的丰富性正可以与之呼应。

我曾经读过一首写风景的诗，反复查找其中提到的地名，无果而终。后来忽然意识到，这也许并非确有所指，不过是诗人将内心的世界具体化罢了。直至读到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等，渐渐就理解了自己的贫乏，知道诗意有各种各样的存在方式。诗从大地而来，浮在空中，但不可否认的是，诗的根扎在心灵深处。后来再读沈从文、汪曾祺、余华和莫言，就觉得诗的样子更为繁复了，分行确实是诗的外貌，而不分行也是一种可能。分行是节奏的强化，不分行则是精神的连贯。诗的外延，使得它自身愈发自在与强大。

我喜欢和学生一起读诗，我读出的也许是一，他们可能读出了二或者三，还有可能读出无穷。我和学生们说，不要用所学框住你的所思，用心去理解不确定的部分，也许就是走向云端的感觉。根据学生的性格，我喜欢给他们分配不同的写作任务，有时候我的理解也有偏差，就由他们自己重新选择写作的内容，写出心底的声音。

“如果你有耐心就继续听/感受神秘流淌过双耳/听见长夜的寂寥/听见寂寥中包裹的嘹亮和暗哑”。一个学生写下这样的诗句的时候，我忽然发现他们已经将诗投射到生活里，内化到心里。诗的样予注定无法固定，那么就让它以飞翔之姿，继续去往远方吧。



《平衡》：滕肖澜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因为脱离了我的舒适区，有太多不确定性。现在想来，这次大胆的挑战，或许是平衡工作带给我的启发。每一份平衡表的诞生，看似是近乎流水线的刻板操作，但借由不同的人来做，从第一个集装箱位写下第一个数字起，重心就像排列组合，有无穷个可能性。写作亦是如此。当我从以往的惯性经验中跳脱出来，换一种从未试过的写法，重新描摹我所熟知的生活，就像有什么东西倏地打开，一下子开阔了。都说都市是水泥森林，那么，这次我想捕捉水泥森林的心跳声。咚，咚，咚。

读书

本版邮箱：dushu@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胡妍妍 版式设计：赵健



佚名《马球图》(唐代)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供图

游戏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文化现象，几乎所有人都接触过游戏。襁褓之中，拍起手掌，蹬动双腿，做出天真动作；走进学校，课余和同学们玩老鹰抓小鸡、躲猫猫；到了老年时代，闲暇之余，许多人也会玩棋牌游戏。

过去，较少有人来专门探讨游戏。游戏很难在学术研究的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当前，“文化热”不断高涨，特别是通俗文化、娱乐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人们对游戏也有了新的认识。越来越多人意识到，游戏作为一种娱乐活动，具有一定的文化意义。

文化心理学家认为，动物运动系统的新陈代谢和生长发育，内在地要求动物不断运动，使其产生一种运动欲，这种欲望一般在物质追求的实际活动中得到满足。当功利性的活动不能满足运动欲时，动物就会自发地“无目的”地运动。功利活动过量时，机体又需要紧张后的放松，这时动物会表现出消闲式的“无目的”运动。这两种“无目的”的运动，便是游戏产生的生理机制。

娱乐性、规则性和文化性是游戏的基本特点。游戏活动后，人们会产生愉悦、舒适、兴奋的感觉，得到精神上的满足。而所有游戏都必须在一种事先规定的、为大家所遵守的规则中进行。古代节日习俗中有诸多娱乐活动——蹴鞠、击球、射箭、斗草、登高、走月，其中蹴鞠、击球、斗草都有一整套固定的活动规则，因此是游戏活动，登高、走月虽然也有娱乐性，但因随意性较强，不能称之为游戏。

人们常常按照自己的要求、目的来设计和进行游戏活动，在从事游戏活动时，把自己的主观精神和价值取向融入其中。因此，游戏活动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这是其文化性所在。据文化人类学家考察，一些高等动物也有与人相似的“游戏”活动。区别在于，动物游戏不能体现自我价值，所以不具有文化性，只有人类游戏才是具有文化学意义的娱乐活动。

中国游戏史源远流长。如果从史料记载的先秦时代斗鸡、走狗、六博、踏鞠等古老游戏形式算起，中国游戏已有三四千年的历史。如果从发掘的考古材料来看，中国游戏史一直可以推演到遥远的原始时代。《玩物采真：中国古代游戏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记录的就是中国古代纷繁多样的游戏形式，多姿多彩的游戏场景以及形形色色的游戏轶事，它们构画了一幅长长的、色彩绚丽的中国游戏史画卷，反映了中国古代人民在人类文化史上的独特创造。

游戏史与社会史、生活史、民俗史关系密切。社会条件、社会背景和社会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游戏活动的存在方式和基本特点；各种独特的游戏活动，又会在各个层面上影响和作用于社会。而今，虽然许多古代游戏的身影已经湮灭了，深藏于这些游戏中的文化意蕴却是持久的。

新书架



《欧阳予倩文献图传》：高音主编，杨乐、林金姬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关于欧阳予倩的第一部文献图传，展现这位中国戏剧开路先锋、中国戏剧教育先行者的人生经历、艺术之路和思想脉络。



《我们的国家公园》(全5册)：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省管理局等主编；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这套书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大熊猫、三江源、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5处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和珍稀动植物。

格物致知 得宜有度

——《天下文明：紫禁城规划思想与古代中国》编辑手记

刘蓉林



《天下文明：紫禁城规划思想与古代中国》：王军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为根本遵循，所以作者说：“紫禁城如同一部平铺在京华大地上的《周易》注疏。”观象授时是《周易》的思想底蕴，中国古人以地平方位为坐标测定时间，衍生出时间与空间合一的观念。这一观念深刻定义了营造制度。紫禁城不同的空间对应着不同的时间，后者赋予前者不同的人文意义，这成为规划布局的依据，也成为认识紫禁城的重要线索。

《天下文明》这部著作并不那么容易“啃”下来，但通过阅读，当你了解到紫禁城的平面规划以及明清北京城的整体设计，和我们印象中抽象、玄妙的《周易》以及遥远、高深的古代天文学有着如此直观的联系，当你理解紫禁城宫殿的斗拱攒尖数、御道石板数、平面比例具有如此朴实的文化意义，当你理解琉璃的色彩和阴阳五行承载着农业文化最具基础性的时空体系，你会对紫禁城和中国文化史产生更加真切的认识。

2016年，王军调入故宫博物院从事学术研究。开始写作《天下文明》是在2020年，其中的第一章是为紫禁城建成600年而作；而这本书的出版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在这期间，王军身患重病，但笔耕不辍，只要有需要，他都乐于作为“导游”带人们参观故宫。他会讲殿堂的方位及其所对应的时间意义，讲金水河的

流向与九州地理的呼应，讲二十四节气望柱头与北斗授时的关系，讲北京城不仅有中轴线，还有连接日坛与月坛的东西轴线，讲五行、五色与时空的配合。他说：“别以为经学家都是冬烘腐儒，真正的经学家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能够从事并指导农业生产。古人强调格物致知，格物即穷究事理，服务于生产实践，这是古代文化的基础，我们须扎根于这个层面的研究。”

支撑紫禁城宫廷制度的知识与思想体系，适应了农耕时代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这是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适应性所在。以合时宜为法，以不误农时为纲，宗奉“有度”“得宜”，不以无节之用为人生寄托，作者认为，这种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产生活方式，对于校正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增长主义偏差，推动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捕捉城市的心跳声

——我写长篇小说《平衡》

滕肖澜

小说《平衡》所指的“平衡”，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主人公葛向阳的职业，他是航空公司的一名平衡员，负责不同航班旅客、货物、行李的配载，使飞机保持平衡；另一层，是指人生无时无刻不在寻求一种平衡的状态。工作中，葛向阳是平衡高手，飞机重心把控得精准无比；但生活中却是左支右绌，爱情、亲情、友情，一再失衡失重。

我以往的写作，虽然题材各有不同，比如《城中之城》是金融题材，故事架构和人物设定比较偏职场，《心居》则是从一个上海四世同堂的家庭出发，写不同境遇下的普通百姓生活——但在写法上变化并不大，都是起承转合的传统风格，故事徐徐展开，从容写人物写细节。但这次《平衡》完全不同，采取了梦里梦外跳出跳出的方式。梦里情形与现实呼应，梦是现实的延展、纠错、补偿，又反过来对现实生活推波助澜，类似于心理暗示，激发起人性某种幽深而未必自知的部分。

从某种程度上说，梦里的人像是真人的替身，把真人想说又不敢说的话，想做又不敢做的事，统统说个遍。但微妙的是，最终并不如想象中那般“爽”，并没有“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恣意。小说里葛向阳在梦中回到过去，就像提前拿到试卷一样，“会做

的、不会做的，统统填上标准答案。掐着之前的缺点，一一改正”，最终还是落空了。只因生活恰恰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10多年前，我也曾是一名机场的平衡员。小说里写葛向阳画波音747大型货机的平衡表——“货舱几十块板，A加B有限制，A加B加C有限制……配置第一块板的时候，就要想到第二块、第三块乃至最后一块。板与板之间都有联系，彼此牵制互为因果”，这其实是我切身感受。那种对重心一步步的摸索，像是自己跟自己较劲，为繁冗的过程带来解谜的乐趣，很奇妙。尤其货机多半在深夜配载，周围一片寂静，几乎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

一直写上海，这座我无比珍视的城市。喜欢她那种宽和亲切又恪守分寸的层次感，为写作带来源源不断的灵感。但也必须承认，写了20年上海，在尝试过不同角度、不同题材之后，也会觉得越来越难写了。身在其中，时间空间上零距离，一会儿感叹她的纷杂多变，令人眼花缭乱，一会儿又觉得似乎还是老样子，找不到突破口。

《平衡》动笔前，我定下了这篇小说的风格，“用天马行空的叙述方式，写一个日常的故事”。坦白说，这是我写得最艰难的一次，